



# 湖湘大学堂 精品演讲荟萃

(2011—2016)



湖湘大学堂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HUXIANG DA XUETANG  
JINGPIN YANJIANG HUIJU

文  
化  
与  
生  
活  
篇

CIS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湖湘大学堂 精品演讲荟萃

(2011—2016)

HUXIANG DA XUETANG  
JINGPIN YANJIANG HUICUI



湖湘大学堂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文  
化  
与  
生  
活  
篇

CES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湘大学堂精品演讲荟萃：2011—2016/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539-5386-1

I. ①湖… II. ①湖…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626 号

### 湖湘大学堂精品演讲荟萃 (2011—2016)

---

责任编辑：张艺琼

责任校对：刘源 丁泽良

出版发行：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http://www.hnepb.com>

电子邮箱：[hnjycbs@sina.com](mailto:hnjycbs@sina.com)

微信服务号：多点学习

客 服：电话 0731—8548697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6 开

印 张：13.5

字 数：239000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9-5386-1

定 价：49.80 元

---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编委会

主任：宋智富

委员：刘晓敏 郑升 汤建军 戴树源 丁宇 周发源

黄建华 王鹏

主编：宋智富

副主编：黄建华 王鹏

编者：黄云志 米蓉 李彪 陈巍 龙艳 李一飞



# 目 录

- 001 船山诠释与湖湘文化发展 / 朱汉民
- 011 湘西图像选择与湘西形象塑造 / 赵炎秋
- 017 湘西文化与湘西文化产业发展 / 张建永
- 024 湘西形象三论 / 简德彬
- 031 惊采绝艳话楚骚 / 杨 雨
- 039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 / 唐浩明
- 049 诗意栖居——中国人的宜居梦想 / 刘沛林
- 061 屈原的乡国之情与人格魅力 / 郭建勋
- 069 守护女性健康 拥抱青春梦想 / 卢光琇
- 078 红色湘女更多情 / 张志初
- 090 书香怡人——谈藏书与读书 / 余三定
- 103 让每个孩子都精彩 / 卢 勤
- 117 以史为鉴，认识兴亡周期率 / 孙立群
- 128 碧霄一鹤——朗州司马刘禹锡 / 程韬光
- 145 让善待自己成为生命常态 / 杨金鸫
- 153 现代婚姻：幸福的秘诀 / 叶文振
- 158 湖湘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人文个性 / 郑佳明
- 163 乡关何处——从乡村发现到村落文化 / 李 兵
- 189 附录：湖湘大学堂简介及 2011—2016 年湖湘大学堂演讲活动一览表
- 210 后记

## 船山诠释与湖湘文化发展

朱汉民



>>> 朱汉民先生简介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委、省政府“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的学术兼职：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大学术工程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图书、教育部社科重点项目和其他部省科研项目二十多项。出版《宋明理学通论》《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等学术专著十余部。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教材奖、教育部和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十余项。

这次讲坛的主题是“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今年正好是王船山逝世 320 周年，我想以近代湖南文化界对船山思想的理解与诠释为例，探讨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历程，为今天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个参考的范例。

19 世纪下半叶，湖湘文化发生了瞩目的变化：其一，湖湘文化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地域文化之一；其二，湖湘文化转型，湖湘士人的思想观念急剧变化，成为转型最显著的地域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两个特点，与船山思想的不断诠释密切相关。

### 一、船山诠释与湖湘道学的重振

王船山是宋明理学的继承者。而湖南自两宋就被称作“理学之邦”，北宋时期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是湖南人，南宋时期，湖南形成南宋理学的一支——湖湘学派，故而源远流长的理学传统成为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湖湘士大夫对船山思想的最初解读，当然

是将他看作湖湘理学的正统传人。

在王船山逝世后不久，他的著作开始部分流传。少数有卓见的人发现了船山学说的博大精深，由衷赞扬船山先生“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当然，他们对船山思想的理解，完全是放到理学史背景下的解读，将其思想学说看作是对阳明之学的批判，而目的则是回归濂洛关闽的道学正统。

船山思想真正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受到湖南士大夫、学术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推崇，则是到了晚清道光、咸丰、同治时期。这一切均与此时湖湘地区士大夫群体的崛起有关。道光时期，湖湘地区涌现出一批在政坛、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到了湘军崛起后，湖南的军事地位、政治地位更是迅速提高，由于湘军比清朝的国家军队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历史作用，湖湘地区的儒生、士大夫及军人主宰了清朝的地方政府和主要军事力量。政治、军事、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于是，博大精深的船山学说就成为湖湘文化建设的主要资源，刊刻船山的著作、修建船山的祠堂与书院、宣扬船山的思想，就成为湘军的儒将们所特别关切的事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湘士大夫开始系统刊刻船山的著作，这就是守遗经书屋版的《船山遗书》，湖湘地区的著

名士大夫纷纷参与其事。继此之后，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同治四年（1865年）刊刻的金陵本《船山遗书》，这个版本出版正是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湖南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达到历史顶点之时。所以，船山学说不仅成为湘军诸儒将的文化底蕴，也成为湖湘文化崛起的重要文化资源。湘军将领除了刊刻船山先生遗书之外，还修建纪念船山先生的祠堂。郭嵩焘主持长沙城南书院时，于南轩祠边建船山祠，“期以乡里先贤开示学者，知所归向”（《郭嵩焘诗文集》）。可见他建船山祠有很强烈的振兴乡邦文化的意识。后来，郭嵩焘还多次上奏朝廷，奏请将船山从祀文庙，以提升他作为清代大儒的地位。

自王船山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逝世以后，由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嘉道时名声骤起，再到咸同时的极度推崇，船山先生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这段时期对船山思想内涵的诠释却没有发生变化，即均是沿袭康熙时期以来将船山学说诠释成孔孟儒家的圣贤学脉，将船山视作濂洛关闽的正统理学的传人。譬如，在康乾时期，从王船山著作由其家人刊刻开始，无论是其家人，还是初步接触船山学说的乡贤、士大夫，均将船山学说看作是传承宋明理学的学统。

邓显鹤一方面强调船山是宋代道学的正宗传人，另一方面又希望湖湘之士传承其道统，显然是出于建构湖湘文化、重振

湖湘道学学统的需要。因为自元明至清初，湖湘理学的地位在下降。当清初时名士刘献廷发现船山之学时，竟然说：“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这一方面是肯定王船山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元明清以来的“圣贤学脉”是何等不堪。在这种背景下，以邓显鹤为代表的湖湘士大夫张扬、诠释船山之学，当然是希望以此为契机，重振湖湘道学，建设乡邦文化。

曾国藩、郭嵩焘等湘军集团的儒将推崇船山之学，不仅是重新刊刻《船山遗书》，还修建祭祀船山先生的祠堂，并上奏朝廷请求将船山从祀文庙等，均是为了重振湖湘道学，建设湖湘文化。这一点，郭嵩焘在长沙城南书院创建船山祠时，表达十分明确。郭嵩焘一方面表彰周敦颐、王夫之两位湖湘学人能够“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对湖湘文化光大于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由濂溪、船山所开创的“乡贤之遗业”以能激励、启发以后的湖湘学子，以“辟吾楚之榛荒”的精神重振湖湘文化。郭嵩焘奏请朝廷将船山从祀文庙，其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光大乡邦文化的愿望，当他的上奏被礼部驳回，而浙抚上奏辅广从祀文庙获准，他感叹说：“吾楚人不务表彰先达，竟无一能主持其事者，闻浙抚此奏，为之垂涕竟日。”（《郭嵩焘日记》）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乡邦文化情结。

由此可见，船山先生逝世后曾有很长

一段时间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但是，到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由于湖湘士大夫群体的逐步崛起，特别是湘军集团成为晚清中国的主宰力量后，船山学说的潜在学术价值、文化资源价值为湖湘士大夫所发现、理解与推广。但由于这个时期湖湘士大夫的主导文化思想是理学，所建构的是理学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因而他们所理解、诠释的船山学说，就是承宋代濂洛关闽以来的正统理学。他们刊刻遗书、修建祠堂、请祀文庙，均是出于这一根本原因。

## 二、船山思想的诠释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晚清中国的政治格局、文化观念的变革甚为剧烈。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一直都有强烈的经世情怀，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变法图强的必然趋势，在他们的努力下，湖南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省份。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文化观念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湖湘之地参加维新变法的士大夫群体，不仅强调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发展，同时还强调文化观念的演变转型，从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发展。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带来了船山思想的重新解读和诠释。船山思想本来就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船山先生不仅有对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精华的系统总结，同时也在“道莫盛于趋时”的感悟中对文化发展的趋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所

以，船山思想又成为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重要资源。在对船山思想的重新诠释中，被梁启超称为当时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作为一个晚清的湖湘学人，谭嗣同很早就学习了船山的思想学说，他自称是“私淑船山也”。但是，他是一个有着鲜明近代思想的激进思想家，以“冲决思想网罗”而著称当世。所以，尽管他与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湖湘士大夫一样极力推崇船山学说，但与曾国藩等人所理解、诠释的船山学说相比，其思想观念、价值倾向、历史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曾氏等人所诠释的船山学说是“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曾国藩《船山遗书序》），“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而谭嗣同所诠释的船山学说则是现实社会纲常名教的对立者，是要引发“世乱”的启蒙思想。所以，谭嗣同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对船山思想做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诠释。



谭嗣同在诠释船山思想时，从船山学说中引申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成为湖湘文化近代化的重要资源，

故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十分合拍。在政治思想上，谭嗣同认为船山是倡民权的思想家，他说：“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顾亭林之学，殆无足观。”（《谭嗣同全集·上欧阳中鹄（十）》）他认为船山学说中的大量民本思想，完全表达了近代兴民权的政治要求，故而是建构中国近代化文化、实现湖湘文化转型的重要资源。在伦理思想上，他认为船山的理欲论是完全不同于程朱理学的，他说：“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故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非如紫阳人欲净尽之误于离，姚江满街圣人误于混也。”（《谭嗣同全集·仁学（一）》）他认为船山先生充分肯定人欲的伦理观念，也是合乎时代发展、实现文化转型的近代思想。

谭嗣同对船山思想的诠释，使得船山不再是濂洛关闽之道学的正统传人，不再充当“扶世翼教”的文化责任，相反，他是维新变法的倡导者，是鼓吹民权、自由、平等观念的近代思想家。船山思想成为正在建构的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

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立志于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人们开始倡导推翻清朝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曾经是维新运动开风气之先的湖南省又出现了一大批倡导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派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思想中本来就包含大量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思想，湘军集团领袖人物虽极端推崇船山学说，却对船山思想中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只字不提。但是，从戊戌到辛亥，船山思想中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当时革命派人士的密切关注。当时的革命派十分推崇船山学说，并将其作为反清排满的思想武器。

章士钊先生就是一位在维新失败后力主排满反清的革命派人物，他特别重视阐发船山先生的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在1903年于《国民日报》上发表的《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就是专门以船山史学观念来诠释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一开篇就说：“亡国多才，自古已然。王船山者，亡国之一国民也，故其言皆亡国之音，所说多亡国之惨。今绎其义，可得而言。”所以，章士钊通过对船山史学的引申，借古代史上夷夏之争的民族问题，以号召人们排斥满洲贵族为“异族”。在他眼里，船山思想的核心是民族主义，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几十年后，章士钊先生谈到他当年

为什么作《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仍然强调船山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在《疏〈黄帝魂〉》一书中说：“太炎于前明遗老，推服船山至上，其所为推服之故，则在船山入山惟恐不深，志与‘群胡’断绝关系。”他还认为，“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

如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宣传家杨毓麟也以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诠释船山思想。杨毓麟的反清民族思想，曾深受谭嗣同的影响，谭嗣同曾以湘军的保卫清室是“铲灭同种，以媚胡族，实负天下之大罪”，而杨则深以为然，以此为“湖南负罪于天下也”。所以，他对船山先生的“种族之戚”有着强烈的同感，并引王船山为湖南人中“有特别独立之根性”的杰出代表，以期望建设一个独立的“新湖南”，最终实现“存湖南以存中国”。（杨毓麟《新湖南》）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这段时期由于船山的著作广泛刊行、船山思想广泛传播，王船山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儒，其学说已超越了地域文化的意义，已经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谭嗣同、章士钊、杨毓麟等人对船山思想的诠释，仍然有着地域文化背景，具有实现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意义。

首先，我们从湖湘地域文化背景来看这些维新派、革命派人物对船山学的推崇与学习。自从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湖湘

士大夫积极刊印船山著作、修建船山祠堂以后，船山学已经成为湖湘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与重要资源，地方意识很强的湖湘士大夫无不积极读船山著作，受到船山学的深刻影响。据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所说：“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不仅是“咸、同之际”，此后的光绪、宣统之时，湖湘的知识群体、政界名流，亦得力于船山之遗书。谭嗣同能够提出那么深刻的思想而成为思想界的彗星，也是由于他从小就接触、学习船山学之故。

其次，当时湖湘士大夫们热烈推崇船山学说，也有很强的弘扬乡邦学术、光大地域文化的特别意义。清初有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道光、咸丰时期，湖湘士大夫大多强调船山是三大儒之一。但是，到了戊戌、辛亥时期，湖南士大夫大多强调船山学更加重要、地位更高。他们推崇船山学，也是推崇湘学与湖湘文化。正如杨毓麟所说：“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杨毓麟《新湖南》）

其三，戊戌、辛亥时期湖湘知识群体对船山思想的近代性内容的诠释，还有推动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后创建船山学社、创刊《船山学报》的革命派人士刘人熙那里表现得很充分。他在《船山学报叙意》中提

出：“不佞湘产也，在湘言湘，愿与湘人士昌明正学，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刘人熙推崇船山学，是立足于“与湘人士昌明正学，以新吾湘”的湖湘文化建构与发展。他所诠释的船山先生的“独往独来之精神”，正是近代湖湘文化建设的目标。

### 三、船山思想诠释的多元化与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古老的中华文明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仍然要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主义势力的顽抗，同时还要面临新的官僚资本所带来的危害。近代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导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当时出现了各种各样希望解决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文化思潮。在诸多不同文化思潮中，有三大主流的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本位主义思潮”，学界一般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等，笔者以为称“民族文化本位思潮”更合适一些。）

自晚清道光以来，湖湘地区一直是中国新的文化思潮衍化发展的重镇。辛亥以后，这一地域文化格局仍然得以延续。自由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主流文化思潮在湖湘文化转型中虽有轻重之分，但是均得到完整的体现。尤有

特点的是，这三大思潮均与船山学的诠释有关。可以说，船山思想已经成为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构的重要资源。

首先，湖湘地域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船山学诠释的关系。其实，从戊戌维新以来到民国时期，湖湘地域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这些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民主主义者大多引船山先生为同道，同时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对船山学做出新的诠释。前面已经论述到的谭嗣同、章士钊、杨毓麟等均是追求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民权等理念的民主主义人士。同时，他们所理解的王船山，就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民权的思想家。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时期。如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司长、总统府政治咨议，后又任代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刘人熙先生，就是一生服膺船山学。他于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创船山学社并任社长，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创办船山学刊。刘人熙所理解与诠释的船山思想，就是具有“独立之精神”的自由主义理念，即所谓“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往独来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刘人熙《船山学报叙意》）。这一“独立之精神”，是所谓“独立之国”“独立之教育”“独立之学术”的根本。这显然是以独立、自由、民主的近代西方观念对船山思想做出的创造性诠释。

杨昌济也是深受维新、辛亥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他留学日本、英国多年，广泛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细看民国初年杨昌济先生的思想言论，就可以发现他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倾向，这也影响了他对船山思想的诠释。杨昌济经常以他所接受的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伦理观念来重新诠释船山思想。譬如，他这样说：“王船山曰：‘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船山重个人之独立如此。”船山所说的“自践其身心之则”，其实就是儒家对道德主体性的重视，杨昌济对船山伦理学的特点以近代“个人之独立”做出诠释，并认为“吾国伦理学说，最重个人之独立”。杨昌济先生还将王船山的“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的观点理解为“船山亦主张人本主义者也”。（杨昌济《论语类钞》）这一切，均体现出民主主义者杨昌济对船山学诠释的近代化特点。



民国初年兴起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潮，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本文不称其为“文化保守主义”，是因为考虑到这一思潮的先

驱人物的思想并不保守，而是维新、革命运动中激进人物，如其早期代表人物梁启超、熊十力等人均接受、倡导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理念。但是，由于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依然要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转型为辛亥革命后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主义，而民族文化本位论就是从这种民族主义中发展、衍生出来的。与船山思想有密切联系的熊十力先生就是这种状况。熊十力是湖北人，从上古的楚地到近古的两湖，均体现出地域文化背景的密切关联，他能够从年轻时就深入研习船山著作、终生服膺船山之学，与这种地缘上的联系有着密切关系。熊十力参加革命十余年，很早就接受了近代的民族、民权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受湖湘学人谭嗣同所诠释的船山思想的影响，而且他接受船山学说与形成革命思想，是同时发生的，他自己说：“时国事日非，余稍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三）但是，辛亥革命后，列强威逼下的民族国家仍然灾难深重，熊十力认为只有重振民族文化、继承绝学、讲明人道，才有可能“扶翌国运”。他这种通过复兴民族文化而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思想，也是来自于王船山。熊十力一直认为船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志在中夏文化之复兴”（熊十力《十力语要》卷十）。由此可见，熊十力作为民国时期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创始人，与船山思想

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对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诠释，其实正是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观念的投射。而且，他所理解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是要以儒家的圣贤之学来解决当时存在的士习民风问题，即所谓的“反身克己工夫”。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或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充分注意到船山思想对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资本主义、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湖南地区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毛泽东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体现出的“中国化”，就包含着船山思想在内。青年毛泽东求学期间就接受了船山学说，他常常星期天去船山学社听船山学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也是王船山的崇拜者，他在课堂上常常讲到船山的思想。所以，毛泽东的《讲堂录》中还留有关于船山思想的课堂记录。船山思想不仅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还用船山学说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李锐所说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一九三七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

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事实上，毛泽东的两部重要哲学著作，即《实践论》与《矛盾论》，与王船山先生的知行观、阴阳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参阅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该书对船山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深刻影响有系统论述。）由于地域文化传统的原因，青年毛泽东很早就接受了这个“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的船山学，所以他在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自觉地将船山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后来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包括嵇文甫、侯外庐、张岱年等，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对船山思想的诠释，并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船山哲学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 四、通过诠释船山而建构湖湘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清朝到民国，湖南人将船山从尘封的历史中发掘出来，这与现实的湖湘文化建构的需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历史上船山思想的诠释过程，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建构过程。

湖南人为什么要通过对王船山的不断诠释而建构湖湘文化？这种对历史文化的诠释能够建构出合乎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化形态吗？这种诠释具有客观性吗？

文化的发展必须借助于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因为文化传

统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千百年来逐渐创造并留存下来的，是这个地域、民族赖以生存的先在条件，也是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性贡献。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文化也必须不断演进、发展，但是这种演进与发展均是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都必须将文化传统中有着恒常价值或现代意义的部分保留下来，发扬光大。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急剧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从咸同时期的理学复兴、洋务思潮，到光绪时期接踵而至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民族文化本位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并起，这些不同的文化思潮均能够通过诠释船山思想，以实现文化的建构与创新。王船山的思想学术是湖湘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他对民族、人类、天道的深刻思考及其精神文化成果，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高峰，船山思想中许多重要的思想文化观念不仅具有近代意义，甚至有着恒常的价值。因此，湖湘士大夫通过对船山思想的推崇与诠释，以实现湖湘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就能够将湖湘文化的传统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这就是清末民初士大夫与知识群体通过诠释船山而建构湖湘文化的根本原因。

那么，为什么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杨昌济、章士钊、刘人熙、熊十力、毛泽东等这些思想观念差别如此之大的人，均认同同一个人的思想？

由于时代背景、历史语境的差别，湖湘知识群体所理解、解释的王船山，与那个历史的王船山是不能等同的。但是，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对船山思想的诠释，仍然具有真理性与客观性。这种思想诠释的客观性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诠释者（不管是曾国藩、谭嗣同还是毛泽东）与诠释对象（王船山）是否真正实现了“视域融合”。

那么，湖湘士大夫、知识群体不断地诠释船山思想，以达到湖湘文化建构的目的是否成功，有一个客观条件，即取决于船山思想本身。要能够实现船山思想与不同时代知识群体的“视域融合”，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船山思想本身是否合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身？事实上，船山思想本身是具有这一条件的。王船山对中华

传统思想文化做了深刻的反思与系统的总结，涉及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各个领域，并且都能够全面汲取这些领域中的思想精华。这样，他的思想学术本身就成为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王船山又能够以超越历史的眼光深刻地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提出一系列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观念。这样，晚清以后那些与时俱进的湖湘士大夫与知识群体，在建构湖湘文化和中华文化时，都能够通过不断诠释船山学说，而从事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显然，这也是由于晚清以来的湖湘知识群体与王船山之间的“视域融合”。

（2012年6月12日，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博物馆）

# 湘西图像选择与湘西形象塑造

赵炎秋



## >>> 赵炎秋先生简介

湖南师大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大外国语学院兼职教授，湖南“121”人才工程第一梯队成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省文艺理论学会会长，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项，教育部课题四项，省社科基金课题五项。曾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四等奖和优秀奖多项，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二等奖一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三等奖多项。

科研主要在文艺学、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三个方面展开，在文学形象研究、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狄更斯小说研究、文字与图像、文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成果，得到国内同行肯定。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形象诗学》等九部，论文《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影子作者》《构建历史与道德的二元张力》《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等一百六十多篇；译著《马丁·朱述尔维特》《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等四部。

科研主要在文艺学、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三个方面展开，在文学形象研究、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狄更斯小说研究、文字与图像、文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成果，得到国内同行肯定。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形象诗学》等九部，论文《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影子作者》《构建历史与道德的二元张力》《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等一百六十多篇；译著《马丁·朱述尔维特》《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等四部。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预言“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随着时代的发展，图像已经多到使我们腻烦甚至窒息的程度。我们已经进入“读图时代”。那么，图像与我们生活、与现实社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湘西这一特定的地域，谈谈图像选择与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 一、视觉文化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人类表达与交流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语言，一是图像，相应形成印刷与视觉两种文化。印刷文化的核心是语言，视觉文化的核心是图像。图像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狭义的图像指二维平面上的静止形象，如绘画、照片和包括卡通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图片。广义的图像指所有用视觉直接把握的艺术形式，它包括如下几种类型：①二维平面上的静止形象，如绘画、图片；②二维平面上的活动图像，又可分为纯活动图像如无声电影，没有声音的录像、哑剧片等，配有其他因素的活动图像如电影、电视、有声录像等；③三维立体形象，如雕塑、建筑；④现实中的活的形象，如舞蹈、戏剧、人体艺术等。我们这里谈的图像是广义的。

语言与图像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就存在与反映世界的方式而言，图像以具象的形式存在，它对世界的反映是直接的、直观的，而文字则是以符号的方式存在，它对世界的反映是间接的、抽象的。其二，就图像而言，人们用感官把握到的形式与其最终在脑海中形成的形式是一致的，而就文字而言，人们用感官把握到的形式与其最终在脑海中形成的形式是不一致的。其三，图像与思想的关系是间接的、分离的，而文字与思想的关系是直接的、同一的。

当代文化之所以向视觉文化转化，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相对而言，图像具有许多语言没有的优势。其一，由于其形式把握上的感官与心灵的一致性，图像更容易把握与消费，更能给观众带来感官的刺激与感性的愉

悦。其二，由于图像的直观性、具象性，相比语言，图像更具普遍接受性和世界通行性。很多图像如交通标志、公共场合的标示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通用语言。其三，由于其感官的冲击力，图像更具有审美的震撼力。其四，由于其反映世界的直接性与直观性，图像更具有形象表现力。

在20世纪之前，由于制作、保存与传播等方面的困难，图像无法大规模地展开，图像的这些优势也无法很好地发挥。20世纪之后，随着摄影、电子技术、计算机和网络的产生，图像的制作、保存与传播变得轻而易举，图像活动的大规模展开成为现实，图像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随着图像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视觉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成为与印刷文化并峙的另一高峰。

## 二、图像选择与形象塑造

所谓形象，指的是一事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种整体印象。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形象所有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进而影响到形象所有者的感染、影响与号召力，决定着形象所有者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能否为他人接受。因此，在现代社会，从个人到国家，无不注意自身形象的塑造。

从实物与符号的角度，形象可以分为实体形象与符号形象。

从文字与图像的角度，符号形象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纯文字形象，如陶渊